

《周恩来风采》丛书



巧解矛盾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姜爱凤 著

重庆出版社



巧 解 矛 盾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姜爱凤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98 年·重庆

责任编辑 周世慧
封面设计 王 多
技术设计 刘黎东

姜爱凤 著

巧解矛盾——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625 插页 4 字数 188 千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66-3886-8/K·204

定价:11.00 元

内 容 简 介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在世界历史政治舞台上,诞生和终结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它叱咤风云,领导了这一风云变幻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4 年多的共产国际革命实践,既有巨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错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共产国际与各国党关系发展史不是一条笔直大道,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指令与自主、集中与分裂错综交织,构成一幅不完满的历史画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挫折。共产国际在帮助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给中共党带来了许多困惑和束缚。周恩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代表中共党处理与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解矛盾,消释怀疑,争取理解和支持的卓越才能,以及为党忍辱负重,大公无私的高尚品格和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为中共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增添了特色。

本书从细微处着手,通过对周恩来与共产国际有关的文件、文章、资料、史料的汇集、归纳和提炼,力图从更新的角度、更高的层次上展现周恩来与共产国际之间非凡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出版说明

为了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我社组织了一套《周恩来风采》丛书,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周恩来与中国外交、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等四个方面来展现周恩来在处理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折冲樽俎、巧解矛盾、深谋远虑、以民促官的伟人风采。这套丛书有如下特点:

1. 选材独特。当年中共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新中国外交、中日关系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周恩来用他那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毅力较好地处理好了这些关系,为党和国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几方面的内容也是关于周恩来生平事迹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努力。

2. 作者队伍强。作者是长期从事有关方面学习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他们多年心血的结晶。

3. 融史料性与可读性为一体。由于作者充分占有现有资料,在写作中力图真实再现当年的情景,使这套丛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娓娓道来,使该丛书有较强的可读性。

经过作者和编者的努力,这套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望朋友们能接纳它,同时,我们更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出更多的精品之作来,使有关周恩来的研究更加深入。

编者

1997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章 共产国际成立 周恩来确立信仰

- 一 共产国际成立…………… (1)
- 二 艰难探索 确立革命信仰…………… (9)
- 三 初试革命实践…………… (22)

第二章 积极履行共产国际指示

- 一 不遗余力 巩固发展国共合作事业…………… (36)
- 二 借鉴苏联红军 创建新型革命军队…………… (49)
- 三 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指令与自主的矛盾…………… (59)

第三章 审慎务实 变通协调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 一 实践中变通共产国际指示 协调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75)
- 二 照顾大局 相忍为党…………… (94)
- 三 苏区三年 贡献特殊…………… (102)
- 四 周恩来与李德…………… (114)

第四章 机动灵活 独立自主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 一 遵义会议 独立自主的一次先例…………… (131)
- 二 西安事变 独立自主的一次范例…………… (145)

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独立自主的一次考验	(172)
第五章 三次赴苏 贡献卓著	
一 首次赴苏 坦陈己见	(192)
二 再次赴苏 巧解矛盾	(203)
三 赴苏疗伤 和谐乐章	(210)
第六章 共产国际解散 历史的交汇点	
一 共产国际解散 新旧历史的交汇点	(223)
二 周恩来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思想	(227)

第一章 共产国际成立 周恩来确立信仰

一 共产国际成立

1919年3月2日至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宣告了共产国际成立。尽管有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残酷迫害和伯尔尼国际的百般阻挠、蓄意破坏,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典、荷兰等21个国家的35个组织,共52名代表还是克服种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由于中俄交通阻隔,中国国内的革命者无法参加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中国旅俄华工刘绍周、张永奎应邀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共产国际的诞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组织,在长达1/4的世纪里领导了这一风云变幻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理论思想、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对各国革命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影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共产国际的创立既不是某些杰出人物的“即兴之作”,也不是

少数人主观意志支配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共产国际的成立是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共产国际成立起到了一种历史催化剂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东欧和中南欧许多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1918年1月,芬兰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成立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宣告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同年,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巴伐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都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反动的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在1918年-1919年间,罗马尼亚、南部斯拉夫、波兰、西乌克兰也都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

与欧洲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相适应,在十月革命影响和推动下,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亚洲的印度、朝鲜、中国、土耳其、越南等国都爆发了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非洲的埃及、摩洛哥、利比亚、苏丹等国也爆发了反帝武装起义;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尼加拉瓜等国也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十月革命后,风起云涌的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与轰轰烈烈的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相互支持,互相鼓舞,交映生辉,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幅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

进程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反动统治阶级历来都不会听任世界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更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会表现得更反动更残暴。针对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革命,各国反动派纷纷云集巴黎,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联合起来,试图绞杀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扑灭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之火,扼杀给世界被压迫人民带来光明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消灭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任何革命运动。面对这一切,如何在“波涛汹涌的帝国主义大海”中,保卫苏维埃政权这一全世界工人和劳动人民所瞩目的“孤岛”,并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①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面对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必须联合起来,步调一致,协调作战,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促进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成立领导和协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组织势在必行。

其次,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长期斗争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第二国际内部多年来小心翼翼掩盖着的社会沙文主义和改良主义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宣告了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彻底破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战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这一严峻现实,向国际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迫切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工人运动何去何从?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高瞻远瞩,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为代表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起,顺应历史潮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正确回答和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十分迫切的问题。他们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

极开展反战活动,并同公开的和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促进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在国际舞台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列宁就在《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一文中提出了建立新国际的设想。他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工人群众定将冲破一切障碍建立新的国际,目前的机会主义的胜利是维持不久的。”^②列宁在为布尔什维克党起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关于战争的提纲中,明确阐明了大战的性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大战中的任务,并再一次提出建立新国际的思想。他指出:“未来国际任务,应当坚定不移地摆脱社会主义中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潮。”^③1914年11月1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的《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一文中指出:“第三国际现在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资本主义政府举行革命进攻。发动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④从1914年—1915年,列宁相继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叛徒的反动本质的著作。列宁还亲自参加了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召开的两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在两次会议上,列宁充分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智慧,团结左派,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作了坚决斗争,促使左派与机会主义分裂,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

列宁反对战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对启发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集聚和团结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产生了极大作用,加速了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建工作。

欧美各国陆续建立了第一批共产党组织。阿根廷、芬兰、奥地

利、希腊、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法国、英国、意大利、丹麦、瑞士、加拿大、美国等都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第一批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为共产国际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由于当时各国共产党比较年轻,在组织上、政治上还不成熟,迫切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团结起来,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以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血风腥雨中诞生的共产国际,以其鲜明的特点,伟大的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几乎每一个成员党,都或多或少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每一个组织毫无例外都有自己的特点,共产国际相对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共产国际是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都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⑤共产国际对各国党拥有特殊权力,可以修改各国共产党决议,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或个人,派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直接任免各国党领导人,有权决定各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

其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民主集中制是其组织原则,夺取政权的手段是暴力革命,实行严格的革命纪律,提倡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第三,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享有特殊地位。共产国际章程明确规定:“执行委员会的主要工作,由世界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该国共产党承担。该国共产党在执行委员会内应指派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5人。”^⑥共产国际及其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联共(布)共产党员。联共(布)党员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拥有50票的表决权,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所有特点中,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对各国共产党影响最甚。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有一个逐渐形成、强化和终结的过程。

第一阶段(1919年—1924年),从共产国际成立到第四次代表大会,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的形成时期。

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决议》、“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共产国际章程》,都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作了明确规定。文件指出,共产国际是一个统一的、坚决的国际组织,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只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应该由共产国际下一次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⑦“三大”通过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强调每个党都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实行高度集中制。“四大”通过的《关于改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今后工作的决议》,规定各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人数要由执委会确定;执委会有权向各支部派遣拥有最广泛权力的特派代表;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将一切会议记录按时送交执委会;各支部的代表大会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方可召开,以便更好地传达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由此可见,在共产国际前期,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已经比较完备地形成了。

这一阶段,共产国际虽然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但由于列宁重视民主,民主辩论的风气尚存,这种领导体制的弊端在各国党的实际斗争中不仅未造成重大的不良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各国党的迅速建立和巩固,推动了

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二阶段(1925年—1935年)从共产国际“五大”到“七大”前夕,是高度集中领导体制不断强化达到极端时期。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渐掌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大权,他利用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服务于苏联的一国利益,并将它发展到极端。1925年3月,共产国际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要求各国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成为最布尔什维克化的党”,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由一个国际性的中心来全盘领导,才能赢得胜利”。会上斯大林明确宣布: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谁否定它的干预权利,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共产国际“六大”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有权设立常务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南非局、东方局等等),以便同共产国际各支部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和更好地领导他们的工作。要求各支部必须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各项指示。强调派遣到各支部去的特派代表有权参加他们被派前往的那个支部的中央机关或地方组织的一切会议。这些特派代表只对执委会负责,在个别情况下,遇该支部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违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时,特派代表可以在支部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一般会议上发言反对该支部的中央委员会,他们甚至对各国党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负有监督责任。这就形成了上有“执行委员会”,下有“特派代表”,中间建有“常务局”三位一体的极为严密而又高度集中的领导体系。从思想上、行动上和组织上全面控制了共产国际各支部。

进入30年代,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出现了武断地处理一个国家共产党组织的做法。

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在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全面实行布尔什维克化而不断得到强化。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作风武装了各国党,使他们加强了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但也给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共产国际逐渐沦为联共(布)共产党的对外工具,联共(布)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联共(布)将党内的派别斗争移植到共产国际内,造成了各国党内的宗派斗争与分裂。不断强化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对各国党的严格控制,使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成为神圣化的教条。

第三阶段(1935年—1943年)从共产国际“七大”到共产国际解散,这是共产国际高度集中领导体制从极端到削弱直至终结时期。

由于这一体制在实际斗争中给各国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再加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各国党在斗争中逐渐成熟等原因,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开始总结其经验教训,承认了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大会认为,由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共产国际难以灵活地领导各支部的工作。大会通过了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决议。对各国党而言,的确是松了一绑。但是,共产国际“七大”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从“七大”到共产国际解散,八年未开代表大会,大权完全由代表大会转移到执委会及其主席团手中,根本不把各国党放在眼里,仍对各国党事务横加干涉,甚至达到撤换他们的领导人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的程度。

物极必反,随着各国党的逐渐成熟,各国党独立自主意识日趋强烈,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学会自己当家作主。使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岌岌可危,最终走向解体。

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是时代的产物。这种体制如果说在共产国际前期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话,后期则是明显的弊大于利,甚至束缚了各国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许多方面深受共产国际这些特点的影响,特别是高度集中领导体制对中共党的影响更深刻更严重一些。

共产国际成立之时,周恩来正在樱花盛开的日本探寻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国内伟大的五四革命运动的爆发,促使周恩来立即回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

二 艰难探索 确立革命信仰

1919年4月,周恩来带着初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欣喜心情,离开了美丽的樱花之都,回到了他深深担忧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严冬刚过,刚刚苏醒的中国大地上正爆发着一场席卷神州的伟大的群众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影响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感召下发生的,是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运动是由北京学生发起的,天津学生首先起来响应,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周恩来回到阔别一年半的天津,由于他一贯的品学兼优,思想敏锐,真诚热心,享有威信,很快就被推举参与了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周恩来以极大的热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中去。

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一台旧时的印刷机静静地躺在那

里,这是周恩来参加五四运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的历史见证。五四时期的周恩来坚定地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这台印刷机记载了周恩来同南市荣安大街的协成印刷局的工人共同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胜利出版而努力工作,同甘苦,共患难的一段历史。那时的周恩来,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为一身,经常到协成印刷局来,通宵达旦地同工人们在一起,共同商议解决印刷中遇到的困难,并亲自参加印刷劳动,同时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与印刷工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日本留学时的周恩来,通过日本的“米风骚”就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政治大罢工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充分表现了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使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刮目相看,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所蕴藏的巨大威力。五四运动中,他们把拯救中国,彻底改造社会制度寄希望于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并为此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许多努力和尝试。

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阵地,起到了唤醒民众,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的作用。该报分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等栏目,主张和时评两栏是其重点,周恩来撰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反动军阀政府的罪恶本质,抨击封建主义的一切旧观点、旧传统、旧习惯。《会报》以其观点鲜明,笔锋辛辣,指点现实,提倡民主,唤起民众而备受关注,享有声誉。南京《少年世界》把它比作时代的“新曙光”,“把这种光照遍了全中国各处,群起效法,……将来的新中国,不是现在的中国了。”^⑨上海《新人》杂志称赞《会报》“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在《会报》创刊号上,周恩来专门以《革心、革新》为题发表社论,明确提出了“革新”与“革心”的口号,“革新”就是改